

《论语》之英译智慧——以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文为例

刘晓芬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DOI:10.61369/EIR.2026010009

摘 要：《论语》英译历经数百年演进，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成为文明对话中智慧传递和文化重构的关键实践。本研究以“文本的再生”、“译者的使命”和“读者的回响”为内在逻辑主线，以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为理论支撑，选取理雅各与辜鸿铭译文，通过文本对比与话语分析，揭示不同历史语境下，译者对“信”“达”“雅”的差异化诠释，不仅塑造了文本的跨文化再生形态，也深刻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学智慧的理解与认同。本研究旨在推动中国典籍外译从“被动阐释”走向“主动建构”，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主体性国际传播。

关键词：典籍英译；文化传播；身份认同

The Wisdom of Translating "The Analects" into English: A Case Study of James Legge's and Ku Hung-ming's Translations

Liu Xiaof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has evolved over centuries, transcending mere linguistic conversion to become a crucial practice of wisdom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intercivilizational dialogue. Guided by the internal logical framework of "textual regeneration," "the translator's mission," and "reader response," and supported by Yan Fu's translation criteria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his study conducts a textual compariso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James Legge's and Ku Hung-ming's translations. It reveals how translators' differentiated interpretations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n varying historical contexts have not only shaped the cross-cultural re-creation of the text 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Western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Confucian wisdom. This research aims to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passive interpretation" toward "active construc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systematic and subject-oriented global transmission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引言

先贤孔夫子，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以“仁”立教，更以“述而不作”养《论语》之气。在中国哲学家当中，孔子在西方被研究得最多^[1]，而《论语》是除《道德经》之外翻译成西方语言最多的中国典籍^[1]。全球化语境下《论语》英译研究日益呈现多维度图景。现有研究或宏观分析英译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20]，或微观聚焦核心概念词的英译策略^{[16][18][22]}。

严复“信达雅”标准对应翻译的忠实性、可读性与文化适应性，为本研究提供有效理论纽带。通过比较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译本，本研究在“文本-译者-读者”的框架内，为《论语》英译在中观层面提供新的视角，以培养面向典籍英译的系统性、主体性的国际传播战略意识^[5]。

一、文本的再生

《汉书·艺文志》提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代时，《论语》有《鲁论》、《齐论》和《古论》三种版本；今本《论语》是以曾子一派的《论语》即《古论》和《鲁论》为底本，混合别派的《论语》而成的^[6]。正是这种“门人相

与辑而论纂”的独特生成方式，不是由单一作者的主观视角系统写成，赋予了《论语》文本一种根本的“再生性”。

（一）语内再生

《论语》再生的第一步，发生在汉语系统内部。译经之难，在于理解，在于传达^[10]。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一字一义。在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的辅助下，“一字一义”的汉语属性界限模糊。

作者简介：刘晓芬（2002—），女，湖南常德市桃源县人，汉族，湖南农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笔译。

同时,《论语》所记录的孔子语录片段,脱离具体对话场景,其意义高度依赖消失的历史现场。面对此双重困境,中国学术传统以浩繁的注疏作出了系统性回应,历代注疏层累叠加,构筑了其意义阐释的宏伟谱系,此即经典的“语内再生”过程。

(二) 语际再生

当《论语》需要跨越语言边界,“再生”便进入更为复杂的“语际”阶段。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曾敏锐指出,置于章节末尾的注释常令读者生厌,因为频繁翻查会严重打断阅读的连贯性^[9]。在跨文化的“语际再生”过程中,如何处理源语文本厚重的注释传统,成为译者必须权衡的关键技艺。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 Confucian Analects^[10]。理雅各的翻译深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影响,并在注释中频繁引用朱熹观点,他以严谨的考据精神,首次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可赖以研究的标准译本^[2],被称为“汉学史上的里程碑”^[11]。1898年,辜鸿铭的第一本译著《论语》在上海出版,这是由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的《论语》^[10]。辜鸿铭在译序中直言理雅各之失在于未能传达经典的哲学与道德真义。这一实践极大丰富了“语际再生”的理论内涵,是一种“抗争性再生”,标志着《论语》英译在“语际再生”层面从“被动他塑”迈向“主动自塑”的关键转折。

二、译者的使命

自1593年利玛窦将《论语》译为拉丁文肇始,《论语》文本的再生从未停止。至19世纪,《论语》英译渐成热潮,据杨平^[23]统计,截至20世纪初的50部英译本中,三分之二出自西方译家之手,三分之一则由中国译者或海外华人完成。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译本尤为突出,他们在“信、达、雅”构成的永恒张力场中,清晰地折射出自身作为译者在典籍翻译过程中所承载的核心使命^[12]。

(一) 译“文字”

理雅各的翻译使命,是为西方汉学建立一个精确、可靠、可供稽考的学术文本系统。他的实践以“信”为最高且先行的原则,且这种“信”首要体现为对中文经典权威注疏传统,尤其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性忠实。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理雅各英译正文: 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

可以看到,理雅各将“仁”译为了“true virtue”,但在随后的注释中,他明确将“仁”与“benevolence”建立等同关系,并在对应此句的注释中,写下了关于“仁”译法的关键性论述。在《论语》翻译中,他也极力保持“仁”译法的高度一致性。纵观其译本,“benevolence”及“benevolent”出现了上百次,成为“仁”最稳定的标签,完美体现了理雅各“译文字”的使命。这种一致性与严复的“信”不谋而合,旨在构建一个清晰、稳定、可供系统研究的概念体系。

(二) 译“文化”

典籍翻译不仅是从源语到译入语间的语言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锋^[7]。

原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里仁》)

辜鸿铭译: How can a true gentleman be known to the

world if he is without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true manhood?

仔细揣摩,辜鸿铭的译文对“仁”的处理与理雅各形成鲜明对比,他并不寻求与某一权威注疏的字面对应,而进行文化定锚,服务于宏大的文化阐释与文明辩护使命。“true manhood”是辜鸿铭精心选择的译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中,“manhood”超越生理年龄,指代一种成熟的、负责任的、充满道德勇气与尊严的人格完成状态。它与“gentleman”形象相联,但更侧重于内在的品格与力量。“the essential qualities”中的“essential”意指“构成事物之所是的”、“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仁”对于“true manhood”而言,不是一种附加的美德,而是其存在的构成性要素。试将这一译法放在《论中国人的精神》进行理解。辜鸿铭在该书中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灵魂与理智的和谐”,而“仁”正是这种和谐的体现,是“柔软的同情心”与“刚健的正义感”的结合。因此,“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true manhood”中的“true”,恰恰对应了他所捍卫的“真正的”中国人性格,这是一种基于“仁”的、深邃而平和的精神气质。他的目的非常清晰,要打破理雅各各式译法将“仁”局限于“仁慈”的狭窄理解,将其提升到“人格本质”与“文明精神内核”的高度,在西方关于“何为人”、“何为理想人格”的讨论中,强势植入来自中国文明的答案。因此,辜鸿铭的“仁”之译法,是“仁”这一概念充满主体自信与战略智慧的“再生”。这完全超越了“译文字”的范畴,成为了“译文化”乃至“译文明”的典范。

三、读者的回响

理雅各与辜鸿铭通过对“信达雅”价值次序的截然裁定,履行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前者是学术的引介者,以“译文字”的严谨,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为《论语》确立了精确、客观的坐标,其“信达雅”统一于学术的维度。后者是文明的对话者,以“译文化”的宏旨,致力于将儒家智慧转化为活的精神资源,其“信达雅”统一于文化辩护的维度。他们的工作表明,译者的使命最终定义了一部经典被“再生”为何种形态,也预先设定了其将激发的“读者的回响”。

(一) 于本土读者

奈达指出,译者的译文要使其读者的理解和欣赏能够与原文读者达到本质上相同的程度^[4]。中国学者与知识阶层对理雅各译本的回响,集中于其学术性信实。然而,这种以注释浩繁为代价的“信”,使其译文的“达”严格服务于学术圈层,语言风格失去了“雅”。因此,对于寻求精神共鸣而非文献研究的普通本国读者,该译本虽令人敬畏,却难免产生文化情感上的疏离感。辜鸿铭译本在本国激起的回响则更为复杂与热烈,其译文的流畅、雄辩与充满比喻的“达”,以及融合西方经典以提升儒家地位的文明对话之“雅”,深深契合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中渴望被世界理解与尊重的集体心理。读者从中获得的,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提振和话语权争夺的示范。然而,也正是因其为实现高层次的精神之“达”与文明辩护之“雅”,而普遍牺牲了字句层面的考据之“信”,使得该译本在专业学界长期备受争议^{[24][25]}。

(二) 于跨国读者

近百年以来,中国译介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论著已做了许多

工作,但把中国文化经典介绍给世界的工作却做得太少^[8]。赖德(Arthur F.Wright)在其《中国思想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287)一书的序言中所说,“汉语的翻译者面临一连串困难。从数量上看这些困难同别的翻译者困难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缺乏共同的风俗习惯、语言因素和价值,每种类型的困难都增加了,而且由于成千年文化传统的巨大压力,每一种类型的困难进一步扩大。”^[9]

对于不谙中文的西方读者,译本是他们接触《论语》这部中国文化经典的唯一通道。他们对“信”的感知是间接的、经由译者的“达”与“雅”所传递和塑造的。因此,译本的“达”是否流畅、“雅”是否令人欣赏,直接决定了读者能否以及愿意走进文本,并接受译者所“信”的那个孔子形象。辜译本首要的冲击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当时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从一个等待启蒙与拯救的“野蛮”或“停滞”的帝国,转变为一个拥有自成体系、可与基督教文明平等对话的成熟道德哲学的文明。当读者读到孔子以流畅典雅的维多利亚英语、与歌德和莎士比亚并肩而立时,他们固有的“西方中心”身份认同受到了微妙挑战,但同时获得了一种“与伟大文明对话者”的满足感^[21]。这种满足感源于辜氏策略性的“雅”。他用目标文化中最受尊敬的语言文体包装源文化,使接纳孔子智慧成为一件不损害、甚至能提升读者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事情。这本质上是一种经由高层次文化归化实现的身份认同^[19]。

四、结束语

《论语》的研究,包括译本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

入^[10],基本核心词译法分析、多译本对比、文化顺应理论分析、文章翻译学解读、文体意义探讨等多视角研究为《论语》英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路径。本研究通过对理雅各与辜鸿铭译本的比较分析,正是对上述宏观与微观研究路径的一种中观层面的综合与衔接,以严复的“信达雅”为理论纽带,将翻译活动置于“文本的再生”、“译者的使命”、“读者的回响”这一动态闭环中进行考察。这一框架使研究得以超越单纯的概念辨析或泛化的文化批评,得以深入阐释为何同一部《论语》,经由不同译者在“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会再生为不同风格的文本实体,并最终在读者中,无论是本国学者还是跨国大众,激发截然不同的文化认同与思想回响^[11]。

因此,汪榕培先生所指出的“缺乏主体性、系统性译介”的困境,其破解之道,恰恰在于对翻译本质的深刻反思与战略重构。未来的中国典籍外译,不应仅是微观技巧的精进或宏观目标的空悬,而应自觉进入“中观”的协同视野,它必须是以我为主的、系统的文化阐释工程^[17]。这意味着,需要培养一批兼具坚实国学功底、精湛外语能力、深刻比较文化视野及清晰战略意识的译者,不仅能在语言层面追求“信”与“达”,更能站在文明对话的高度,实现一种服务于中国智慧当代国际传播的“大雅”^{[13][14]}。唯有如此,中国典籍的外译才能从对既有西方汉学成果的“被动阐释”,真正转向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与时代关切的“主动建构”,既准确传达本真精神,又能被世界真切理解、尊重乃至欣赏^[26]。

参考文献

- [1] Aikman, D., & Pearson, S. Response to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J]. 金陵神学志, 2005, (4): 44-55.
- [2] Girardot, J.N., & Berthrong,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review)[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10, 31(3): 412-417.
- [3] Legge, James. Confucian Analects[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4] 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M]. Leiden: E.J. Brill, 1964.
- [5] 陈秀娟. 优秀传统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研究——以《论语》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 (15): 223-225.
- [6]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A]. 黄兴涛等, 译. 辜鸿铭文集(下)[C].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1-157.
- [7] 过常宝. 《论语》的文体意义[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6): 29-34+141.
- [8] 胡作友, 刘倩倩. 注释与源语文化的异域重构——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例[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02): 124-135.
- [9] 黄国文. 典籍翻译: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2, 9(06): 64-71.
- [10] 姜倩. 普及型《论语》英译应如何作? ——基于对八个海外译本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017, (03): 69-75+94.
- [11] 刘雪芹. 译本中的语码转换: 一种语境化信号——以《论语》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3, 10(04): 99-107.
- [12] 孟健, 曲涛, 夏洋. 文化顺应理论视阈下的典籍英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J]. 外语学刊, 2012, (03): 104-108.
- [13] 屠国元, 许雷.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彰显——转喻视角下辜鸿铭英译《论语》策略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8(06): 211-215.
- [14] 王东波. 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文化翻译的范例[J]. 孔子研究, 2011, (02): 121-126.
- [15] 王东波. 《论语》英译的缘起与发展[J]. 孔子研究, 2008, (04): 119-125.
- [16] 王辉. 《论语》中基本概念词的英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05): 116-121.
- [17] 王勇. 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J]. 求索, 2006, (05): 178-181.
- [18] 王勇, 秦思. 从话题突出到主语突出: 《论语》中话题句英译考察[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30(04): 7-12.
- [19] 王宇弘. 辜鸿铭《论语》英译的文章翻译学解读[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04): 119-128.
- [20] 王琰. 《论语》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当代发展[J]. 中国翻译, 2010, 31(03): 24-32+95-96.
- [21] 魏疆东, 刘雪芹. 文化典籍翻译中的“再语境化”——以《论语》疑难章句英译为例[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2, (02): 36-41.
- [22] 杨平. 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a, 31(10): 21-32.
- [23] 杨平. 《论语》英译的概述与评析[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b, (5): 37-47.
- [24] 张继文. 《论语》概念词义解读与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长春大学学报, 2009, 19(07): 46-49.
- [25] 张政, 胡文潇. 《论语》中“天”的英译探析——兼论其对中国文化核心关键词英译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15, 36(06): 92-96.
- [26] 张小曼, 卞珍香. 译者声音的差异化分析——以《论语》英译为例[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01): 55-65.